

● 蒋见元 刘 凌 译

「法」安娜·塞德尔 著

西方道教研究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法] 安娜·塞德尔 著

蒋见元
刘
凌
译



西方道教研究史

顾廷龙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道教研究史 / (法) 安娜·塞德尔著; 蒋见元, 刘凌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9

ISBN 7-5325-2791-3

I. 西... II. ①塞...②蒋...③刘... III. 道教—研究—西方国家
IV. B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714 号

西方道教研究史

[法] 安娜·塞德尔 著

蒋见元 刘凌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6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23,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2791-3

B·313 定价: 11.10 元

中译本序

这篇篇幅不大的《西方道教研究史》是已故国际知名汉学家安娜·塞德尔的名著，发表在法国远东研究院出版的《远东亚细亚研究纪要》第5期(1989—1990)上。安娜·塞德尔曾担任过这本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

安娜·塞德尔，1938年生于德国柏林，其后一直生活在慕尼黑，1954至1955年还曾在美国念过短期高中。由于在童年时代深受二次大战所带来的苦难，安娜·塞德尔一生仇恨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一直同情和关心弱小民族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事业。在慕尼黑和汉堡，安娜·塞德尔开始了她的汉学研究生涯，并且一直在令人尊敬的赫伯特·弗兰克的影响下进行工作。在汉学研究中，她的良好的历史哲学基础得到了完美的发挥。在1961至1968年之间，安娜·塞德尔到巴黎从事汉学研究，成为法国著名汉学家石泰安和康德谟的学生。1969年她的博士论文出版，内容是论述汉代道教中老子的神学思想。这以后的许多年中，她一直是法国远东研究院的成员，并且长期移居日本国，在京都市上京区风景优美的相国寺里同休伯特·杜尔脱一起建立了法宝义林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和日本佛教《法宝义林》的编辑工作，并且从1985年起开始主编《远东亚细亚研究纪要》杂志。这个研究所多年来一直是汉学家、研究人员、学生和其

F147/37 叶

它访问者关注和参访的地方,并且以它的高度的研究水平成为国际范围的汉学研究的象征。

安娜·塞德尔对于佛教的研究仅仅是她整个学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她专致献身的研究领域仍然是道教。这也使她成为国际学术界道教学研究的带头人之一。众所周知,由她和霍姆斯·威尔奇合编的第二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的论文集《道教的多面观》,其中的论文无疑是70年代国际道教研究水平的代表。当然,她的研究注意力中也加进了日本宗教(特别是山岳崇拜和地狱等)的内容。

这本《西方道教研究史》,原来的英文题目可以直译为《1950—1990年西方的道教研究概述》。西方有人评价这是一部“令人敬畏的、鼓舞人心的和纪念碑式的”著作。现在,蒋见元、刘凌先生不辞辛劳地将它译成中文。我想,任何一个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同意这个说法,并且认为毫不夸大。这部著作,包含着安娜·塞德尔的对于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深厚感情,表现了她的敏锐而犀利的文风以及深邃透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这部力作中,人们自然会想到,安娜·塞德尔的研究综合了德、法两国汉学研究的传统,并且成为这个独一无二组合的代表。

80年代中期,安娜·塞德尔曾用中文信向笔者表示过要来中国上海访问的愿望。但是,大概由于疾病困扰,终未成行。1991年秋天,她在美国作了肝移植手术后,不幸突然逝世,当时,她只有52岁。这个年岁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来说,实在可称是英年早逝了。两年以后,当我受聘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机会赴日研修时,只能在相国寺的参天古树下凭吊和怀念这位曾被国际学术界青年学

者们尊称的“老大姐”了。

中国的道教研究需要学习和借鉴国际学术界对于道教的研究经验、方法和成果,这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的共识。因为,海外对于道教的研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而我们中国对于道教开展全面而认真的学术研究才不过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事情。国际学术界上百年来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道教史、道教经典、道教仪式和法术、道教和民俗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华人中的道教现状,都作过广泛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宗教学的一个分支的道教学建立的基础已经逐渐齐备了。上百年中几代汉学家们对于道教的研究,尽管目的不同、方法不同,但是他们的不少优秀研究成果都是我们中国学者要重视、学习和借鉴的。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退一步讲,一个外国人,学说汉语,学写汉字,学会理解和翻译古汉语,既无暴利可得,又无盛名可取,一辈子默默地从事研究和整理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工作,这样一种精神不也值得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学者尊重和敬佩吗!

当然,毋庸讳言,我们对于道教的研究方法同外国学者的方法有许多不同。我们中国学者既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又有熟悉语言、文字、民俗、文化等有利条件,更有作为中国人的对于祖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因此,我们理应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比外国学者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以尽快赶上和超过国际的道教研究水平。这十多年来,我们也正是在这样做的,并且已经取得了国际公认的长足进步。

安娜·塞德尔这位“老大姐”是仁慈的,又是严厉的;是热情的,又是不讲情面的。她的学术生活中容不得半点虚假。80年代末,她在读了罗竹风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

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时,曾经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宗教学者在编写该书时的理论准备不足和对于百年来西方宗教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理论成果的不够清楚。这些话是刺耳的,但是又是符合宗教学的发展规律和中国宗教研究的实际状况的。今天,当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罗竹风主编的《人·社会·宗教》以及卓新平编者的《西方宗教学研究导引》等书先后出版,一批当代和古典的外国宗教和宗教学的学术著作被译介进国门,中国宗教研究以及道教研究已被日本某些学者称之为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时,安娜·塞德尔如果九泉下有知,我想,也一定会仁慈地微笑的。

谨以此序悼念尊敬的安娜·塞德尔博士。

陈耀庭

1994年金秋

附记:

本序曾经安娜·塞德尔博士的同事、法国远东研究院的劳格文博士读过,谨此志谢。

序 言

本书并不是仅仅对于最近道教研究的学术成就的综述，尽管我确实企图将最近的重要研究都收罗进去。它也不是如马伯乐、巴雷特已勾勒于前的那种西方学者对道教的研究和发现的历史描述^①。最后，它既不是对道教的一般性叙述，也不仅仅是一份经过注释的文献提要。我所努力的目的是企图概括什么是现今我们所了解，并且自信已经理解了的道教。因此，文章就没有必要反映整个道教系统中各种主题的重要性，相反，只是着眼于那些引起西方学者兴趣和研究的主题。我试图这样建构我的描述，即使得每一文句或者至少每一段落概括一种研究，至于我用于选择各项研究的标准和尺度，则在“文献目录”的开头予以交代。在此，我有必要引用詹姆斯·J·Y·刘为专业综述文章所写的题词：“疏略了一本著作并不意味着对其缺乏尊重，同样，提及一本著作也不意味着毫无保留的赞同。”^②

对于向学子们介绍研究课题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而我认为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获得这种方法的启示来自

①马伯乐(5)；巴雷特(3)。(作者名后的括号中的数字为本书末《文献目录》中所列的该作者作品的序号，下同。)

②见西尔伯杰尔德(1)。

我的老师傅欧伯所发表的关于整个汉学领域的描述文章^①，那是一份卓越的、成功的精心杰作，与他同道的学者中没有人敢于再作一次这样的尝试。

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始于1981年，那是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道教研究者对于一份1949年以来西方道教研究的概述表示了兴趣之后。这篇概述最初是为中国读者而写的，并且强调了一些问题，诸如恢复道教地位的需要，将道教区别于一般宗教，从其自身丰富的文献和教规的源泉去研究道教等等。由于中国人不需要一个西方人来告诉他们关于日本的道教研究，所以这一部分在撰稿之初就被排除在外，而实际上西方的许多研究倒是建立在日本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上的。这样，这本著作首先是奉献给我们的中国同事们，最深切地希望它能够促进他们对自己的宗教遗产进行研究；同时也希望它能够作为一种对话和合作的基础，西方的道教研究者迫切需要这种对话和合作，而且已经等待了四十年了。

由于种种原因，在1982年我用法语和中文完成了第一份草稿之后，不得不中断了这个课题。然而，到了1988年，当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担任两门中国宗教的课程时，为西方研究道教的学生写这么一本著作的需要又提到了我面前，向学生作介绍时材料的缺乏使我将旧稿从废纸篓里捡了回来。由于我们还没有一本全面的道教史能超过康德谟的《老子与道教》^②以及用作教科书的百科全书

①傅欧伯(1)。

②康德谟(5)。

中关于道教的各种叙述,因此,这本概述就应该为不断增长的道教各专题研究成果提供有效的指导,它应该比文献目录更富于资料性,比简单的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更易于理解。

要把这种概述写得毫无偏见和非常完善当然是不可能的,任何叙述必然偏重于那些作者最熟悉的题目和部分。再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对于道教的研究大部分只是我的专业研究的副业,而我从事这项概述工作也只是因为专职的道教研究者尚未向学生提供这种必要的帮助。因此,有些研究成果,尤其是未曾出版的那些部分,有可能我没能注意到。

希望读者能够提出批评,并提供另外的材料。我们将很乐意在备忘录的以后几期中提供篇幅,以作补遗和出版这本概述的修订本。但是,正所谓盖棺方能论定,这本书所能遇到的最好命运,就是在为道教研究的发展作贡献方面越早过时越好。

我要感谢诸位朋友和同事,他们在这本书的各个写作阶段所给予的帮助,对于书稿的完成是必不可少的。休伯特·德特看了全部书稿,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法津·巴尔德丽安-侯赛因、朱迪思·博尔茨、伊莎贝尔·罗比内特、爱德华·谢弗和斯蒂芬·博肯凯普阅读和纠正了早期书稿中的各个部分。厄休拉-安吉列卡·塞瑟克、巴巴拉·亨德里斯克、桑迪·卡夫勒、利维亚·康恩、约翰·拉格威、法布里齐奥·普雷加迪奥阅读了最后的校样,而且作了重要的订正和补充。玛丽亚·哈比托-雷斯打出了一部分早期的稿本,伊利沙白·肯尼和帕特丽夏·山田纠正了英语文本的文风。埃伦·内斯卡对文字的加工不能不说是道教的上帝对这项工作进行的赞助,同她在一起讨论,使我在最后的写作阶段

获得了许多灵感和改进。至于本文所有的错误和疏漏,当然是由我负全部责任。

目 录

中译本序	陈耀庭
序言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道藏》中的老庄精神	6
第三章 原始资料	12
一、《道藏》的历史	12
二、《道藏》之外的原始资料	17
第四章 道教的历史	20
一、总述	20
二、公元1至10世纪的道教史	21
三、唐代以后的道教史	30
第五章 道教的世界	36
一、神仙和神话	36
二、宗教地理学	39
三、神圣的经文	41
1. 经文及其传授	41
2. 中国的图形语言	43
3. 护符的书写体	45
四、超自然的官僚结构	48

1. 社会方面	48
2. 道德方面	52
五、人体和长生的修炼	54
1. 人体及其术语	54
2. 生理的实践	55
六、炼丹术及其内在性质	60
1. 实验室的炼丹术(外丹)	60
2. 体内的炼丹术(内丹)	63
七、仪式	65
八、神像画	72
第六章 道教在中国文化中	78
一、帝国的宫廷和祭礼	78
二、官僚作风和儒教	81
三、艺术	86
1. 诗歌	86
2. 书法	88
3. 绘画	90
四、民间宗教	92
五、医学	96
第七章 道教和佛教	99
一、原始的中国佛教经文	102
二、道教经文中的佛教	106
三、佛道之争	109
四、共同的发展	110
第八章 中国之外的道教	114
一、朝鲜	115

二、日本	118
1. 道教在日本的考古和早期文本证据	119
2. 外佛内道	121
第九章 道教研究之展望	126
文献目录	132

第一章

导 言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组成部分的道教,在西方却是最迟被发现和被研究的。通过道教本身的渊源来理解道教的这种认真的集体努力开始于1950年,当时,戴密微出版了马伯乐的遗著。之所以延误到这个时候才认可道教,与其说是实践上有障碍,还不如说是思想观念上有盲点。在17、18、19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形象是由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来描述的。这些传教士受到他们的儒家老师的影响,因此,他们向欧洲读者所描述的中国文化,更近乎一种不可知论的和井井有条的儒家理想社会,而不是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以传教士的眼光看来,中国百姓所尊奉的宗教是一种与基督教完全不相容的“迷信”。除了一些受到儒家老师尊重的书本之外,他们对道教还是茫无所知。这样,自从1820年艾贝尔·雷姆塞翻译《道德经》以来,至1977年奥和罗的译本为止,这本书已经被上百次地移译为所有欧洲主要的语言。而且,传教士没有能力区别道教和民间迷信的不同:他们将除了明显是佛教以外的宗教现象都看成是粗鄙的,将曾经一度是“纯粹的”道教哲学的老子 and 庄子的学说贬为渣滓。这种误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精华中是特有的,再加上传教士们梦想着创造一个

新“儒教”的中国,净化所有的迷信,并使之皈依基督教,因而使得这种误解长久地存在下去,非常顽固。它的影响之所及,远远超出最初的传教士范围(甚至影响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道教”辞目,包括第十四版的),西方和中国的学者都使得这种误解长盛不衰,以致它们至今还出现于中国的宗教研究者的著作中^①。

19世纪末,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开始了,而且很快地在许多欧洲的大学里繁荣起来。一些当时的大学者对道教产生了兴趣,他们中的部分研究至今尚未过时。哥罗特所做的关于厦门宗教生活的调查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描绘当时风俗的很有价值的原始资料^②,而这些风俗后来就消失了。这一研究体现了19世纪末欧洲人的思想,除了那些描绘其新教民“迷信”的传教士之外,哥罗特是对于活跃在他周围的中国街道和寺庙中的宗教产生学术性兴趣的唯一的欧洲人。这一时期的其他方面杰出研究不是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而是埋首于欧洲的图书馆内。他们将欧洲的历史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关键方法用于中国古代的书籍。沙畹和伯希和探讨了《道德经》^③、《化胡经》^④和《太平经》^⑤文本的历史。我们还把对泰山和对唐代“投龙简”仪式的第一流研究归功于沙畹^⑥,他的研究包括第一次讨论著名的道教

① 参见《东亚研究备忘》1988年第4期,190、250页。

② 哥罗特(1)。

③ 沙畹(2);伯希和(2)。参见吉拉尔多(4)。

④ 伯希和(1)。

⑤ 沙畹(5)。

⑥ 沙畹(6)。

护符《五岳真形图》(1910年),以及第一次研究《道藏》中一部关于仪式的典籍(《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哈佛—燕京道藏引得520号,1919年)。

20世纪前半叶,欧洲有一种新的思想趋势,寻求对构成人类意识的基本结构有更完善的理解。在探索对社会共同意识有更深刻、更客观理解的过程中,非欧洲的文化随着重新恢复的兴趣被提了出来:将另一种文化的思想和社会组织从其本身消除得越是干净,就越容易从中提炼出人类思想共有的基本功能和一切社会行为的基本结构来。这些基本结构激发和制约了一个社会中杰出人物的思想意识,然而,这些结构仍然处于知觉的门槛之外。在一个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底层,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的想象和梦想中,更容易把握这些结构。

这种新的观点产生出一门特殊的社会学,其代表人物,在法国是卢西恩·莱维—布鲁赫、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赛尔·莫斯,在德国是马克斯·韦伯(1922年)。这一派的研究者试图通过研究一个特定社会的神话和民间传说、风俗和宗教仪式,从而理解其基本的精神结构。他们中有的人(迪尔凯姆和人类学者)带着西方绝对的优越感和由此而来的进化论观点,审察了原始社会,而有的人(韦伯)则采纳了相对论者的观点去研究原始社会。当他们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古代中国时,迪尔凯姆的学生葛兰言使中国的宗教更现庐山真面目。在他看来,道教是源于神秘的古代“中国思想的伟大主流”,“正统的学说从中分离出来后只能举步维艰”^①。我们

^①葛兰言(2),第二卷,611页。